

崔锦

我存有几幅天津文美斋印刷的笺谱,计有张和庵蜀锦红一幅、钱慧安《闲敲棋子落灯花》一幅、朱倩花图三幅。14岁拜师学花鸟画,对植物学有深入研究的陆辛农(1887—1974)先生说,文美斋笺谱除装册外,“有单页、百页一组的,风行海内”(陆辛农《天津书画家小记》),我收藏的应是单幅装。陆辛农先生又在《陆辛农集》之《先师张和庵公传》中说:“壬辰(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之冬”,张和庵先生“曾为文美斋画百花笺纸”,每页皆有查帖青题诗。张和庵(1852—1908),名兆祥,喜画翎毛花卉,着色清妍,备极工致。此笺画蜀锦红,落款:“和庵”。下面徵残,恐有印一方。查帖青题:“花名蜀锦红,记得幽人种,年年向君开,葵心不转动。”款:“文美斋印,帖青”。后铃“帖青”一阳文印。查帖青,名凌汉,字帖青、铁脚、叠青,又号铁道人,曾于同治四年(1865)教授严范孙先生,时严先生方六岁。查先生对诗词书画、音乐戏曲无一不通,系水西庄查礼后人。陆辛农先生在《天津书画家小记》中说文美斋“集笺纸大小不一,小如诗笺、便条,大如联笺、纸色、印色皆不一。且有诗筒、信封”。我就有一封映庚致严范孙的信,用的也是文美斋的信笺,但篇幅比前述者稍宽。张和庵的《百花笺谱》一出版即风行全国,外地皆有翻刻,可见当时人们对笺之喜爱。我有一封1900年八国联军入津后,李庆增全家随下藏柳一家四处逃难之际,李写给严范孙先生的信,信笺系张和庵画,但多处脱色,亦无文美斋印,当系外地假冒的伪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最有名的文美斋南纸局(店在锅店街)遭洗劫,画版被焚毁。文美斋主人焦书卿又请张和庵再画百花笺谱,而斯时查帖青已逝,张和庵就把查氏诗词在自己新画的作品上,加盖第二部《百花笺谱》。陆辛农先生还说,还有一部张和庵的《百花笺谱》,是由严范孙先生题的诗,遗憾的是,我从没见过此笺。钱慧安先生《闲敲棋子落灯花》画一仕女伏于桌上,一手在棋盘内拿棋子,面前一灯,灯花呈欲落之状,自题《闲敲棋子落灯花》,并有“文美斋监制”五字,阳文“吉生作”一横印。钱慧安名贵昌,别号清溪樵子,画室名双管楼,又自号双管楼主,晚年更名烂柯子,退一老人,让三堂主等,浙江湖州人,一说宝山(今属上海市)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卒于宣统三年(1911),曾在天津杨柳青为齐健隆、爱竹斋、聚亨等画店创作年画。他的年画作品既保留了杨柳青年画的优良传统,又突破了年画对构图匀称的构图方法,画面清新活泼,线条富于变化,色彩淡雅,并在画上题诗落款钤印,大大丰富了民间年画的表现手法,使得年画作品更加耐人寻味。钱慧安来津时正是文美斋主人制作张和庵《百花笺谱》之时,文美斋主人了解到钱慧安的艺术才能,就为文美斋笺谱艺术增添了钱慧安人物的新品种。我有三幅朱倩的笺谱。一是朱倩画的佛手,款:“未中梦庐”,铃“梦翁”一阳文印,“文美”一阳文印;二是朱倩画的枇杷,款:“鹭湖朱倩画”,阳文“倩印”一方,树根旁“文美”一椭圆阳文印;三是朱倩画的石榴,款:“乙酉初夏,梦老写于涵素书屋”,阳文“倩印”一方,右下方阳文“文美”一椭圆形印。朱倩(1826—1900),早岁名琛,字梦庐,号觉未,别署鹭湖散人、玉溪外史、玉溪钓者、青山樵叟、梦庐逸史等,浙江嘉兴人,工花鸟,初法张熊后师王礼,晚年技艺益精,仿华岳得其神似。文美斋主人焦书卿令我格外关注。焦书卿生于1842年,咸丰八年(1858)进入文美斋做学徒。文美斋原系江西游氏产业,光绪元年(1875)焦书卿从族于族人,贷款约六千缗与游氏合资,由他本人任店铺总司。他刻意整顿业务,注重商业道德,因此生意异常兴旺,光绪中叶又兼营印刷,数十年间,津门文人莫不知有文美斋与焦三先生(时人对焦书卿的尊称)者。后焦书卿又在济南、张家口设文美斋分局,严修先生说:“其气象之整肃,执事之和雅,一与津局等。”(《焦书卿先生八十寿序》)文美斋有张和庵《百花笺谱》等产品誉满全国,焦书卿功不可没。此文,我是想说明天津文美斋在当时赫赫有名,这也是天津出版业应该津津乐道的事。

【学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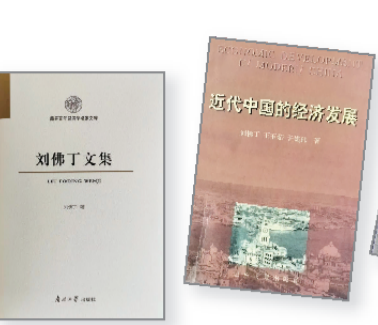
刘佛丁(1937—2000),笔名何立、思毅,福建闽侯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6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留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研究室主任,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系博士生导师。1983年起指导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成为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1年起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1993年起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刘佛丁先生文集及论著代表作



刘佛丁先生1981年起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史学教研室主任。作为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创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或开讲座,使南开经济史学学科的科研工作与国内顶尖研究保持密切的交流,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科研工作之外,先生还先后担任《南开经济研究季刊》(1985—1988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9—1988年)、《南开经济研究》(1989年)的主编,1990年起兼任《南开经济研究》主编。他宽厚的性格、对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所持的开放态度,为《南开经济研究》的发展和建设作出卓越贡献。他任主编期间,《南开经济研究》在历届全国核心期刊的评定中均被列为重要核心期刊,在经济类核心期刊中排名居前;在天津市第二届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南开经济研究》获优秀期刊奖。作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系的院刊,《南开经济研究》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系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生为人诚实、耿直,对学生和后进悉心指导,尽力提携。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对事业孜孜以求,执着而热忱地追求学术真谛,对各种困难和窘境都能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1993年,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会换届,先生被推选为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这意味着他可以同时出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但他却把



王玉茹

刘佛丁： 经济史“南开学派”的领军者

1985年,一道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引领我入门,开启了我随刘佛丁先生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即跟随先生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框架的学术历程。刘佛丁先生上世纪60年代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时,就开始关注“通史”和“通典”中有关经济的史料,以及史中重要的本纪和列传,配合中国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史专题等课程的学习,对先秦的史料作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钻研,他还阅读、学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有关论文、古代天文和历法的知识。本科毕业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后,先生即开始进修资本论、英语等课程,为将要从事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专业知识基础。他先后参与了开滦煤矿企业史的调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主编和参编《解放前开滦煤矿工人阶级状况》《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主编,四卷)(《民国盐务史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涉及民族资本和企业史研究(7篇),盐业史研究(5篇),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研究(11篇),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述评(6篇);发表书评、学术人物述评10余篇。先生性格沉稳、待人谦和,学术视野开阔,有着独特的学术个性和豁达的胸襟,对新的思想、新的研究方法秉持开放的精神。他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但自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以来,就注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提高,跟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新进展,大胆借鉴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集中10余年的时间,倾注全部心血和精力,以全新的方法构建了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先生认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掘和整理资料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理

论和方法的引进、应用。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手段,才能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研究的水平,使认识得以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力和生气。”他还认为:“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用,以求有所发现。”(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 key 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先生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开拓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境界立下筚路蓝缕之功。先生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他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周期波动、市场的发展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一直关心并着手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的推算和编制工作,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他对1850年、1887年、1914年中国国民收入的估算和构建的新经济史框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1996年11月,先生应邀赴日,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担任的日本文部省重点课题“亚洲历史统计”,作了“关于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现状和展望”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主持完成的国家教委(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和国家级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被国际同行誉为“无可比拟的名著,可以称作是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开拓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先生先后指导的“总需求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经济政策中的货币需求”“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效率分析”“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变迁研究”“民初中国对外贸易”“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经济分析”“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政策(1927—1937)”等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一系列博士论文,使他毕生致力于构建的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框架更加丰满。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读诗散札(十四)

“引号”的焦虑

魏暑临

古语说,句读之学,不可一日忽也。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诗的作者若未留下句读的痕迹,读者的句读就会出现“多解”的可能。但句读只解决单位语句停顿或长短问题,现代标点符号,问号等的作用,都无法通过句读体现。今人过录古诗词时,用现代标点影显诗句语气和情感,本属正常现象,但引号的使用常有未安之处。包含人物形象、具有叙事情节的诗,常要描述人物的语言。诗人用陈述或咏叹口吻把人物语言写进诗中,必然经过诗化过程,加之古诗词的语句和韵律相对整齐,与散文口吻差异较大,读者就更不会用散文甚至小说、戏剧的习惯去看待诗中的人物语言,而是默认它们都是诗人吟咏的诗意转述。即便那人物的语言再真实,真实到距离诗人很远,却与那人物很近,我们仍觉得那是诗人对诗中人物语言的“间接引用”。白居易《琵琶女》有大段描述琵琶女倾诉身世的话语,从“自言本是京城女”直到“梦啼妆泪红阑干”。但今人抄录时,为显示琵琶女的自述,就在“自言”和“本是京城女”之间加个上引号,至“红阑干”右边才结束为下引号。其实,不加引号,读者自知其内容属于人物自述;加了引号,诗人的转述或“间接引用”就变成了“直接引用”,姑且不说琵琶女的口语表达本不可能是整齐的诗句,但加上引号把一完整诗句割裂为两部分也显得不伦不类,遇到较真儿的朗读者,是否要在读完“自言”

诗,他秉承写成长篇,末四句是:“寄声灵石山,诗当替余作。便觉鸣玉轩,跳波惊夜壑。”有学者在“寄声灵石山”后面加冒号,再为下一句加引号,仿佛佛洪对灵石山发号施令:“你要替我写诗”,于是自然的天籁就跳波惊壑起来。这固然很生动,但若去掉引号,则“寄声”的“声”就显得抽象而含混,也许是一句号令,也许是一声长啸,不管是什么声音,灵石山都会替他写作,这样,“诗当替余作”就未必是“寄声”的具体内容,也可能是诗人自认为他寄出某“声”后,灵石山就会直接反馈给诗人的结果,也是诗人对灵石山充满信任的评语。如是,诗人的语气不是更为豪爽吗?诗意不是显得更为神奇,且与跳波惊壑的奇幻感觉更一致吗?也有相反的情况。岑参在回罗高冠潭时给其弟写有赠别诗:“昨日山有信,只今耕种时。遥传杜陵叟,怪我还迟还。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棋。东溪但汝处,闲卧对鸬鹚。”有人以为后四句是诗人对弟抒怀,“东溪但汝”的“汝”指其弟。或以为后四句是“山信”中杜陵叟对诗人的倾诉,如《唐诗归》录谭元春评语:“以下四句就将杜陵叟寄来写在自己别诗中,人不知,以为岑公自道也。”则“怪我还”的“我”是诗人自称,“东溪但汝”的“汝”是引用杜陵叟对诗人的对称,其实是诗人对弟。这种奇诡的转变,是理解的障碍,也是品味的契机。古今不少学者争论这四句,都逃不出这两类看法。从诗句内容看,谭元春是对的,诗人要回到高冠潭,与杜陵叟重会,怎么能说自己的弟弟“独向潭上酌”呢?岑参那个年代如果有标点,他一定会给后四句加上引号,以避免读者的争论与焦虑。

沽上丛话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几十年来,每每读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总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说到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便想起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孩童,周日常到距离梁启超故居不远,第一工人文化宫旁边的亲戚家串门,曾听这位老人忆旧闲谈,他小时候总是看到一辆两匹马拉着的马车从门口经过,大人们告诉他,车轿里坐着的一定是梁启超,因为一般人乘坐的马车只由一匹马拉着。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学后不久,到本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府上问学,一眼就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副梁启超写的对联,那是梁赠给自己的学生王力的。我当时心头阵阵发热,觉得这么卓越的老老师离我们真的很近很近。1985年,本系夏晓虹老师在全国首次开设“梁启超研究”专题课,我积极选修,名列“梁研一期”。在那段时间里,我得以系统地研读了梁启超几乎所有著作,公开发表了相关论文。21世纪初,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成立,我自然参与其中。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梁启超故居及饮冰室书斋大修完成且对外开放,迅速成为津城重要的文化地标。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名人,他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名人。1895年,他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他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之一,所以也称“康梁变法”。民国时期,他

梁启超和他的饮冰室： 更研哲理膺新知

罗文华

之家风,堪称家庭教育的杰出典范。通常人们说起梁启超在天津的居所,特别是他的书斋饮冰室,都会指向今天河北区意大利风情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两座小洋楼。现在这里是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梁启超纪念馆,当年即是梁氏一家的居所和主人的书斋饮冰室。然而,梁启超1912年到天津定居初期并不住在这里。1912年10月初,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逃亡日本,已经去国14载的梁启超,终于乘坐日新轮船“大信丸”回到了祖国。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提到,自己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名街(今和平区新华路),“月租百三十元,仅有可住之房四间耳”。这个居所距他创办的《庸言报》不远,而且宅前即公园,可以散步。据此不难推论,这座公园极有可能是当时日租界的大公园(今八一礼堂)。但至于是在荣街的哪一处宅院,则一直缺乏可靠的线索来确认。前几年有文史爱好者在网上贴出一张关于梁启超的老照片,引起我的注意。询问学界朋友,有人说曾在康有为讲过学的广州万木草堂展品中见到过这张照片。照片上是身穿斗篷的梁启超站在冬日的园林里,背景是园



念馆,纪念馆包括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两座建筑。旧居建于1914年,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设开敞柱廊,有地下室和八角形指楼。内设“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展览,讲述了梁启超的思想发展、政治主张和学术成就。饮冰室书斋建于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平面布局呈“回”字形,三连拱门上方有宽露台,具有古典主义色彩。通过百余件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活和工作的场景。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在《自励》诗中表达了要继续努力探求真理和改革社会的决心:“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膺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在天津生活的十几年中,梁启超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实现了自己早年的理想。天津的饮冰室,为近代中国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虽然梁启超辞世已近百年,但人们走近饮冰室时,仿佛还能感觉到从它的窗格里仍在散发出智慧的光芒。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在《自励》诗中表达了要继续努力探求真理和改革社会的决心:“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膺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在天津生活的十几年中,梁启超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实现了自己早年的理想。天津的饮冰室,为近代中国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虽然梁启超辞世已近百年,但人们走近饮冰室时,仿佛还能感觉到从它的窗格里仍在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小楼春秋》解说词：

饮冰室有这一异国情调,是当时按照租界工部局的要求建设的,属于小洋楼,就是现在讲的花园式住宅。梁启超亲自为这座意式建筑取名饮冰室,以此来表达内心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在饮冰室,梁启超和学生蔡儒,共同完成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同时协助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节选,有改动)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满庭芳 第五二五期